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道德王国的重建

李蜀人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道德王国的重建

——康德道德哲学研究

李蜀人 著
导师 黄颂杰
审稿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王国的重建/李蜀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5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012-5

I. 道… II. 李… III. 道德—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334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冯 赛

封面设计 李 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李蜀人 男，1958年5月出生
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
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
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
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
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
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
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
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
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
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
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
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
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
西哲学比较。

内 容 摘 要

康德哲学研究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但是，它又一直处于不断地遭到误读或误解的历史命运之中。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康德两种理性划分的研究纠正以往将康德哲学理解为认识论的误解，明确指出了认识论问题在康德批判哲学中仅仅只是一个导入性问题，意在导出未来形而上学重建这一基本任务，从而实现康德的“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这一根本目的。这并不意味着康德批判哲学就是宗教，而只是说只有终结了认识论，进入超验领域，未来的形而上学才有其重建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又是同人的道德性紧密相连、以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因此，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就成为了康德哲学最本质的体现。本论文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人类建立了一个道德的理想王国，而是将传统的道德哲学奠定在自由和理性这一崭新的基础之上，重建了人类的道德王国。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鐵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2002年6月，李蜀人撰写的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博士论文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点组织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获得通过。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蜀人在“天府之国”埋头于繁重的教学任务，仍不忘根据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继续修改、补充、完善他的博士论文。如今，这篇博士论文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

今年是康德诞生280周年、逝世200周年。康德的名字对于我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对于康德哲学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尚有很长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李蜀人正是跋涉在这条路上的中青年学者，他的这本著作对康德道德哲学形成产生的背景、渊源，康德道德哲学体系本身的构成和内容以及它们对后来直至现当代道德哲学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点是论述康德道德哲学体系本身的内容，包括形而上的道德的基础、原理体系和形而下的权利、义务等等。对于我国的康德哲学研究而言，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

我对康德哲学的了解和理解始于全增嘏老师的教诲，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姚介厚先生一起受教于全老师门下。全老师当时为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制定的计划分为三大块，第一块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核心，第二块以康德—黑格尔哲学为核心，第三块以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哲学为核心。学习康德

哲学一般人都从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但全老师要我们从读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开始，因为他认为，这本书简明扼要，论述清楚，容易入门。实践证明这是很有道理，行之有效的。但那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限制，唯物还是唯心是评判哲学的无可置疑的绝对标准。康德哲学被判定为在两者之间“调和折中”，而“归根结底”还是“唯心论”。从学术上讲，当时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局限于认识论视域，核心是“哥白尼变革”，对其道德论简单地归入唯心论而未予关注，更谈不上从实践哲学、从本体论和形上的视角来加以理解。在我国学术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康德哲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康德的道德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本人也把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和思考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位置上，并且初步形成了对康德哲学的一些看法。

纵观西方哲学史康德确实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他对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解决哲学上的困惑、难题的办法和主张，为哲学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和思路。康德的变革是从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考察开始的，通常称为“批判哲学”。康德之前，洛克和休谟都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对人类理智进行过批判考察，但是，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出经验论者，因为他对理性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理性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发扬，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判，而不像经验论者那样是消极性、破坏性、限制性的。在他看来，理性不仅是认识的能力和活动，而且也是实践的能力和活动，他明确地把理性的功能和活动划分为认识和实践两个领域，因而有理论理性（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分。在认识领域理性作为思辨能力，以先天的知性范畴规整感性材料，构造知识，是为科学，同时也

构造认知对象，为自然界立法，在自然领域建构起因果关联的必然王国；在实践领域理性以自身具有的先天道德律规范人的行为，告诉人“应当”怎样做，达到善的目的，这是道德，是实践理性（意志）为人自己立法，也是向社会颁布规律，在实践领域建构了自由王国。康德认为，传统本体论所追求的最高实体、最终原因、终极存在都与灵魂、宇宙、上帝相关，而这三者是由于理性追求绝对的统一这样一种自然本性所产生的人的主观的思维之物，是先验的幻相，不是知识的对象，不属于人类认识范围，不是理论理性的功能所达到的领域，因此，本体论不是认知的问题，不能通过求知的途径来解决。但是，康德又认为，这三者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是实现道德理想所必需的公设。因为在他看来，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必须按道德律行事，这是善，是德；人具有欲望，又是感性的存在，他要追求尘世的幸福；实践理性为要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这种统一即“至善”），必须设定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当然，在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象世界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统一的，只有在超感性超经验的智性世界、本体界才可能实现。因此，与灵魂、世界、上帝相关的本体论应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是实践领域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家在认识领域苦苦探求本体论问题，而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指出这种探求思路必定陷入矛盾、背谬的困境，他大胆地把传统本体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认识领域转向实践领域，从认识、求知转变为实践、行为。也就是说，康德将哲学从寻求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从寻求知识的基础和根据，进一步引向为文明社会的人寻求如何做人（行为）的基础和根据。

如上所述，康德通过哲学上的变革把人的理性置于首位，使之在认识活动和实际活动中处于积极主动地位，占据主导方面，实际上他将主体、自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学术界称其为主体性哲学，这是西方哲学演进中的重

要环节。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提出了人“认识自己”的重要性，但直至笛卡儿，“自我”始终未被哲学家们所看重，他们总是从我之外去寻求存在和知识的根本原理。笛卡儿提出“我思”作为哲学第一原理，把“我思”与“我在”连结在一起，即从我思出发去解决存在和知识问题。笛卡儿的“自我”是思维实体（心），主要是理性，我思表明自我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主体性登上哲学舞台，也使理性主义步入新阶段。但是，思与在、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是二元分立的，而且，认识的对象是在认识的主体之外先在的，“我们的一切认识都应投合对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即主体符合客体，这已成为传统的思维模式，它意味着自我、主体、理性的能动性依然受到很大的局限。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并非始于一块“白板”，即使感性认识也决非单纯接受对象，决非完全被动，认识的主体、意识具有独立于经验的先天的认识形式，这些形式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些先天形式，经验才成为认识的对象，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所以认识的主体、意识是先验的主体、先验的意识。康德力图消除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所说的主体、自我的个体心理成分，赋之于先验性，把主体性引向先验主义。个体心理意义上的主体、自我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普遍性、必然性，由此去解决存在和知识问题必会陷入困境；先验性的主体所具有的认识形式和道德律独立于任何经验，不依个体为转移，是永恒的又是普遍的必然的，它们正是人类知识和行为的基础和根据。康德的先验主体、先验意识比近代哲学的心理主体、心理自我更具独立性、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独立性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认识形式独立于任何经验，不依个体为转移，不受任何个体影响，是永恒的又是普遍的必然的；能动性指主体的任何一种认识能力、功能或阶段都不是单纯的被给予、接受，即使感性，也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因为感性也有

先天认识形式；创造性指主体构造知识、构造认识对象。近代哲学家也都重视主体、意识的能动创造作用，尽管程度不一，但都未达到康德所说的高度，他们主要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抽象，从公理、公设、真观念、天赋观念出发进行推理，等等，在这里认识的对象（客体）是先存的、既定的，与主体是截然分明的。康德改变了这种认识模式，在他看来，认识的对象和关于对象的认识（知识）都是先验主体、先验意识能动创造的结果。因此，康德通过批判，把传统思维模式颠倒了过来，他在哲学上实现的转向首先表现为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变革”，即从认识的主体“投合”对象（客体）转变为对象“投合”认识的主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简言之，就是客体符合主体。这些观点确实是以往哲学家所未能达到的，是康德在哲学上的创新和巨大突破。这些创新和突破并非只是研究论题的转移或研究重心、中心、核心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路、方向上的转变。

康德在哲学上的创新和突破的更重要的表现是在本体论上进行的变革，即将传统本体论从认知转向实践，从思转向行。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在本体论上都持实体主义的观点，即将宇宙万物之终极存在归之于精神或物质实体，而且通过不断求知的途径、通过概念的逻辑推演，达到最高实体。但是，康德把传统本体论问题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从人类知识领域排除了出去。换言之，他把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看作人类行为、实践所必需的公设，而不是最高的知识、真理，也就是看作实践问题而不是认知问题。在他看来，本体论问题源自人类理性追求绝对统一这种本性或自然倾向，即源于人性，虽然不能在思辨理性的功能范围内通过认知的途径以知识的形式来解决，却完全可以在实践理性的功能范围内予以解决。

康德认为，人在实践领域内的活动受实践理性（意志）所

支配。实践理性以自身具有的先天道德律规范人的行为，道德律必定是“意志的自律”或“自由律”，即意志不受经验世界的规律的支配和影响，自己为自己立法，“纯粹理性的实践力量自身在这里直接具有立法能力。”（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第一篇第一章7，《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这种意志的自律在本质上也就是自由，即意志按自己的规律（法则）规范自己。道德律、意志自律和自由这三者实际上是一个东西。“道德律除了表示纯粹实践理性所具有的自律，或者说除了表示自由之外，别无他能。”（参见同上书，第164页。）所以，每个人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才能意识到自由，也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即作为物自体的我（我本身）。人在认识活动中达不到的物自体，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则能得到证实。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要无条件地服从道德律，这是“善（好）”，是“德”，进行这种行动的意志是善良意志；但是，人又是感性生物的存在，他也要追求尘世的幸福以满足自然欲求，这也是人的本性。实践理性追求德性与幸福的统一，即“至善”，这与理论（思辨）理性追求绝对的无条件的总体（宇宙、灵魂、上帝）一样。但在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经验世界，德性与幸福两者常常相背离；只有在超感性的智性世界、本体界才有可能实现德性与幸福的统一。这种可能不是一种事实，不能被认识，但可以思维、可以想象、可以信仰。这样，实践理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对象“至善”就成了一个本体界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正是为了能实现至善，康德提出，不仅要设定意志自由，作为道德的前提、基石，而且还要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因为人生短促，在感性世界不可能达到道德圆满，必须假设灵魂不朽，使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使趋向道德圆满的无止境的进步得以可能。（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第二节，《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318页；《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91页。）至于上帝存

在的设定，是因为幸福与德性的统一是超感性超经验的彼岸世界的理想，只有确信上帝的存在才能保证理想的实现。这样，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这三个认识领域内思辨理性的“先验幻相”，在实践领域内成了“实践理性的假定”，即人为了达到德性与幸福的统一（至善）而在实践、行动中具有的信仰或信念，这不是一般的经验的信仰而是“先验信仰”。康德就这样把传统本体论问题从认知转变为实践，从先验的幻相转变为先验的信仰，这无疑为本体论乃至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本体论问题不是认识、求知而是实践、信仰的问题；换言之，不是知识领域而是道德宗教领域内的问题。为了达到人性的完善（实现至善），康德把道德引向了宗教，或者说宗教成了道德的归宿。康德的宗教是以理性的实践功能为根据的纯信仰，是理性化、道德化的宗教。这种道德观宗教观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总是有目的有意向的活动，人生在世既要追求现实的幸福快乐，又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实现理想的至善。但有限的人生难以达致两者的统一，人生处境的复杂多变和艰险常使理想和现实背道而驰，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道德与幸福的分离并不罕见。但人又并不甘心这两者的分离，人有企盼和向往，实现道德和幸福的统一。宗教的产生形成正源自于人的这种生存需求，即人性的需求。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正是世界上各大宗教的伦理道德的重要内涵。

康德在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两个方面所进行的变革和创新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它们都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先验主义的结果。这两个变革是以理性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范围与理性的实践能力和活动范围作出明确的划分和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理性在这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和功能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立足于先验主义，即凭借先验的认识形式和道德律，认识领域内科学知识得